

The Critical Momen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关键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
美国与世界



时刻

门洪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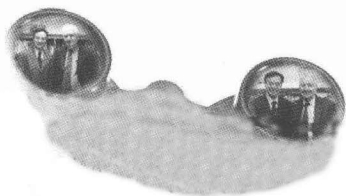
ritical Moment
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关键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时刻

门洪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门洪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301-21352-0

I. ①关… II. ①门… III. ①国际形势—文集 ②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③中美关系—文集 IV. ①D5—53 ②D61—53 ③D822. 371.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560 号

书 名: 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著作责任者: 门洪华 主编

责任编辑: 耿协峰 王晓萌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52-0/D · 31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86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录

导 言

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门洪华) / 3

世界大势

世界政治研究的重大议题(罗伯特·基欧汉) / 35

我们已经变得百无聊赖(兰德尔·施韦勒) / 43

实力的未来(约瑟夫·奈) / 55

自治原则(查尔斯·库普乾、亚当·蒙特) / 64

中国走向

中国第二次崛起及其对全球、地区秩序的影响(熊玠) / 79

一个职业外交官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史伯明) / 90

现代中国的政治与认同：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治理(戴杰) / 107

对中国境外投资战略的评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 117
应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沈大伟) / 129

中美未来

中国正在赶上美国吗?(李侃如) / 147
中国对美国实力的评估(葛来仪) / 152
中国复兴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卜睿哲) / 165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根源(兰普顿) / 178
北京、华盛顿与声望变迁(傅立民) / 190
大国所为：中美关系中的责任与主权(尼娜·哈奇格恩) / 199
金融危机对美中争雄的影响(阿伦·弗瑞德伯格) / 212
应对人民币的更巧妙方式(查尔斯·沃尔夫) / 223
中美关系中的政策议题(李淑珊、托马斯·拉姆) / 232
中美在东北亚的地位与影响(托马斯·芬格尔) / 244
中美寻求共同利益的必要性(柯庆生) / 256
中美战略合作潜力与双边分歧的管理(芮效俭) / 265
中国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吴伟克) / 273

后 记 / 281

導 言



Suffolk 大学演讲(2011 年 11 月 1 日)

关键时刻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门洪华

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打破僵局,促成了冷战的转折和双边关系的突破,展开了改变人类历史的新篇章。^①40年来,中美两国既是世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美关系历经波谷与波峰的转换,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most complex)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

美国精英大多认为,世界正在酝酿巨大变革,而中美关系深刻体现了世界转型的复杂性,中美两国都在回复到正常状态^②;中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全面崛起,而美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衰退导致的霸权焦虑。^③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的衰落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中美博弈却由此进入关键阶段,尤其是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唯一的竞争

*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82—202页。

①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2011年11月8日(与笔者会谈日期,下同);美国前驻华大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所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2011年10月7日。

② 例如:美国前驻华使馆代办、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2011年10月4日;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教务长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2011年10月4日;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2011年10月28日;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2011年10月14日。

③ 美国外交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2011年10月26日。

对手，甚至是多年来的最大挑战，其挑战之全面性超过了当年的苏联。^①中美两国元首确定的“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正在遭受挑战，尽管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②，但其他方面的冲突却似乎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urns)2011年10月24日在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发生巨变的时刻是误解、误判或无意冲突的危险最大的时候。^③

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有鉴于此，崛起强国与既有霸权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需要妥善解决的现实议题。美国精英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悄然改变其大战略趋向，而美国出现战略异动并有可能导致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充满变数，这是一个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美国精英普遍意识到，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中国正在尝试开发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体系，我认为这个目标会实现的。”^④另一方面，许多美国精英意识到，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严峻问题，世界影响力迅速增强，尤其是在东亚势力发展太快^⑤，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中国大战略调整已经开始，这必然导致对美国东亚利益、亚太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巨大挑战。许多精英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冲突^⑥，两国都无法承受相互视为敌人^⑦，但双边关系的剧烈变动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了一种潜在的长期趋势，以及发生长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与日俱增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尖锐分歧具有决定意义，两国关系由此变得

① 斯蒂芬·博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2011年9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ISS)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2011年10月3日；尼娜·哈奇格恩，2011年10月14日。

② 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2011年10月14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Stanley O. Roth)，2011年10月3日。

③ William J. Burns, “Keynote Remarks at 5th Biennial U. S. -China Relations Conference”, Texas, October 24, 2011. See <http://www.state.gov/s/d/2011/176071.htm>.

④ 亨利·基辛格，2011年11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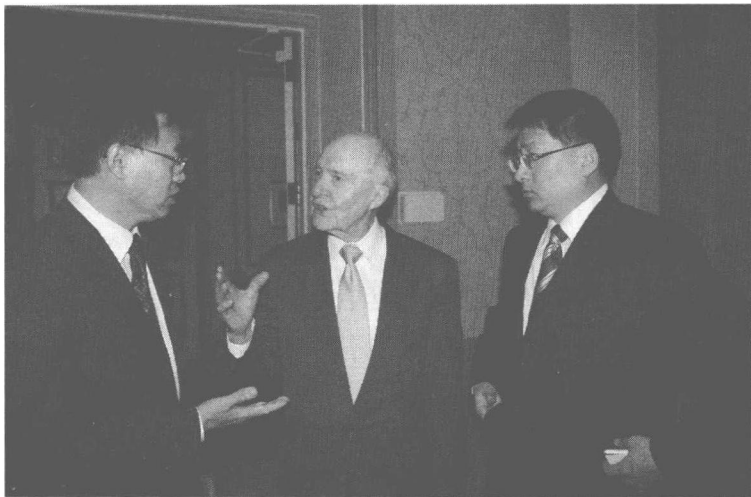
⑤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2011年9月26日。

⑥ 查尔斯·沃尔夫，2011年10月14日；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andt Scowcroft)，2011年11月10日。

⑦ 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更为紧张,而亚洲是中美未来冲突的症结所在。”^①美国精英密切关注美国东亚战略的深刻调整,或称之为美国的主动战略谋划,或视之为防止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自然反应^②,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回应,强调审慎、稳定和动态管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中)
(2011年11月10日摄于费城)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远见、勇气与智慧。^③中美关系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智慧。因缘际会,笔者作为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于2011年9—11月在美国进行了为期50天的研究考察,与美国各界精英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对话,得以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本文正是这次美国调研考察的成果结晶,其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各界精英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面对世界转型,中美同时面临重大挑战与历史机遇,如何拨云见日、高瞻远瞩,规划各自与世界的未来?中国如何从美国精英的认识中见微知著,清晰勾勒对美战略的总体框架?

① 阿伦·弗雷德伯格,2011年9月26日。

②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1年11月7日。

③ 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哈佛大学的演讲,2011年10月12日;芮效俭,2011年10月7日;亨利·基辛格,2011年11月8日。

衰落的焦虑：美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护持霸权、确保世界领导权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大幅调整战略部署亦其常规作为。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与本国情势，长于、勤于战略谋划，致力于维护其西方霸主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更是追求其“单极时刻”的固化，挟其优势打造单极秩序。^①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世界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大国兴衰出现根本性变革，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颓势初现，尤其是 2008 年至今发端自美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推动了世界转型的加速。

世界转型具体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所谓权力转移 (Power Shift)，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首先体现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引人注目，西方大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其次，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权力转移导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 (Problem Shift)，这具体表现在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越加丰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国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②问题转移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从宏观意义上讲，国际政治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体系从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向相互依赖状态发展，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全球治理的意识得到加强。从中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成为大

^①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第 114—126 页；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美国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74—88 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2005 年第 1 期，第 22—29 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 1—13.

国的“战略紧身衣”(Strategic Straitjackets),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正在催生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建设。从微观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鉴于新国际体系形成主要依靠提高自身综合国力来实现,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①

世界转型的加速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催生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重塑。与此同时,开放地区主义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有鉴于此,世界秩序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美国所寻求的单极主导秩序难以建立起来,世界秩序的转型日益体现为以多极化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责任的分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为趋向,以地区秩序建构为先导。亚太地处世界转型的核心,一方面亚洲国家崛起此起彼伏,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冲击着国际秩序和既有大国利益,它们塑造世界能力的增强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走向;另一方面美国将亚太视为其国家利益的重心,力争确保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以维护其既有的国际地位,亚太走向关乎世界未来,也关乎美国核心利益。

美国处于世界秩序重塑和地区格局变动的核心,基于其维护世界主导权、领导权的雄心,它面对的国际挑战无疑是严峻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因为既有的国际秩序大致上是美国主导建构的,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考虑。由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每个大陆上的新兴国家大都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相对快速的的增长,它们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稳步提高,它们完善国际秩序乃至建构新秩序的呼声趋于强烈,美国冷战结束之初建构单极秩序的奢望已经落空,既有的全球利益布局遭受更多、更全面的冲击。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亚洲,在美国精英看来,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主要来自亚洲格局的变化。全球权力格局正在从欧美大西洋时代转向太平洋时代。亚洲尤其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

^① 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2页。

进而扩展其国际影响力。^① 与此相对照,既有的欧、美、日发达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加重、金融系统脆弱、高失业率等难题,出现需求疲软、政治僵局、决策机制失灵等迹象,持续陷入经济停滞和衰退。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已成定局,国际政治重心正在加速东移。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大国兴衰亦在加速,日本走向和平衰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相继崛起,亚洲内部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亚洲格局出现失衡,使得亚洲在形成新的均衡过程中充满变数与挑战,对美国维系亚洲主导地位、确保亚洲战略利益的挑战也相对上升。概言之,对美国而言,亚太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如何确保亚太地区领导地位成为美国的战略核心。

对任何国家而言,把国内事情办好都是海外拓展的基础,美国亦复如是。然而,美国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却来自国内,经济处于困境,财政债台高筑,社会陷入失衡,政治难以决策,国内整体上呈现出最平庸的灰色。

首先,美国经济风光不再,处于艰难的转型之中。尽管很多美国精英冷静地意识到,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占有全球资源的30%—40%不正常,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亦属正常,美国实力下降并不是零和的^②,但低迷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巨额的财务赤字却加重了美国人的经济危机感。2011年,美国存在1330多万的失业人口和1000万的半失业人口,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当年美国仅增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与巨大的失业人口相形见绌,而其财政赤字已高达1.234万亿美元,债务余额达到14.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会2010年立法设定的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在数十亿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浴火重生,恢复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性地位,但这些机构并没有利用公共救助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而是继续其既有的博弈游戏。由于两党政治争斗,美国难以出台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长远可将公共债务降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脆弱的银行业等因素恶性循环,持续制约着美国的经济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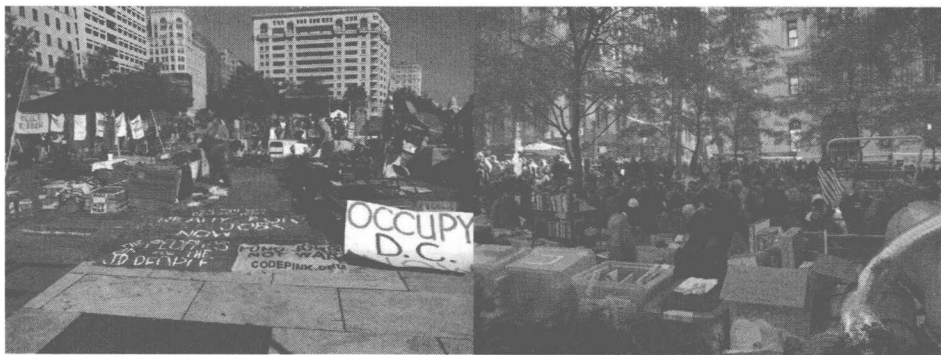
^① 张蕴岭:《寻找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7—11页。

^② 戴维·兰普顿,2011年10月4日。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呈现两党缠斗的局面,且只关心非常具体的问题。^①美国政党政治失去了昔日的节制和中立,美国国会处于分裂状态。自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共和党就公开表示不与他合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Jr.)明确表示,共和党的政治目标就是阻止奥巴马连任。查尔斯·库普乾指出,从政策取向上看,两党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现在却公开讨论分歧,政界人士公开表达其意见,这在美国政治上实属异常。^②美国国会内的辩论表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仅有9%的共和党人给予奥巴马总统积极评价,各种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不相信两党合作能够实现。限于选举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两党之间经常陷入政策僵局,决策机制出现停摆现象。

其三,美国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始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街头政治形式对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严重的贫富不均、决策机制失灵提出抗议,这一大规模、全国性的社会抗议运动剑指大金融机构,对华尔街的贪婪无度表达愤怒,对金融机构缺乏监管、金融市场功能失灵表达不满,对社会不平等表达忧虑,呼吁抵制紧缩计划、改革美国经济、再创美国民主。“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这尤其体现在:贫富差距严重,1%的超级富翁和99%的其他人形成了理念中的对立,1%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股票和有价值证券,近2/3的私人



“占领华盛顿”

(2011年10月7日摄于华盛顿)

“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

(2011年11月5日摄于纽约)

^① 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2011年9月30日。

^② 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净资产集中在5%的人手中。许多人士称，美国处于新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表面上金光闪闪，却掩盖着被撕裂的社会。“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广泛讨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议程。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状，促使美国民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纽约时报》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日渐式微和衰落。加之美国倾力反恐十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7.6万亿美元，6000名美国士兵命丧战场，国内出现强烈的厌战情绪，民意开始变得内向，美国确实陷入了自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当然，美国实力依旧稳居世界之首，其海外资产丰厚，创新能力犹在，重振经济仍有希望，其国防、情报基础并未削弱，依靠其军事部署支撑的外交基础实际上更加牢固了。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首在应对国内政治僵局和社会失衡，如何处理国内问题、恢复自信心和重建社会信任对美国前景更具实质性意义；而如何改变在全球议题上的战略短视、防止从昔日的自信过度和扩张过度走向反应过度，亦是美国面临的核心政策命题。有鉴于此，许多精英认为，美国将关注重心转向国内，进行国内政策大调整已势所必然。^① 笔者则认为，鉴于当前的政治现状，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取决于大选，宏大战略的调整尚需等待。诸多美国精英对美国政治体制可能走向崩溃表示深深的忧虑，而大选能否凝聚共识、国内紧张状况可否缓解亦令他们分外担心。^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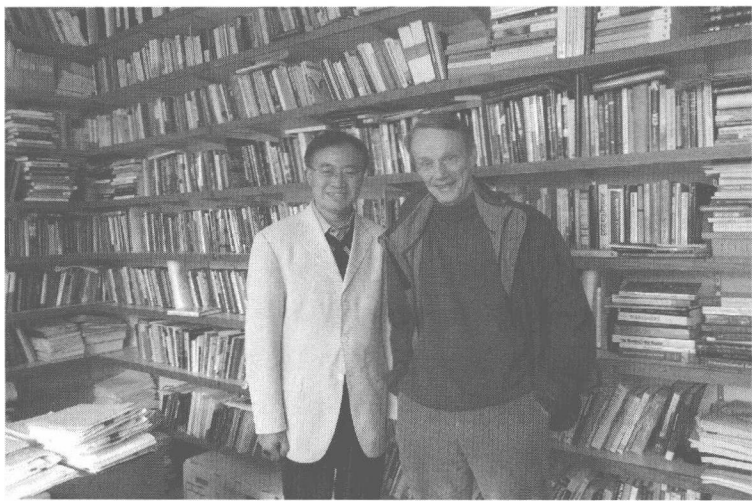
诸多美国精英结合世界转型深入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情势，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到美国永远拥有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是不正常的。^③ 查尔斯·库普乾不无冷静地指出，国际体系走向重构已成必然，未来的世界将是多边的，各种政治体制并存，多元政治并存其间，从绝对意义上看美国并没有衰退，其前景依旧光明；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在全球财富的下降刚刚开始，美国衰落可能历经数十年之久，但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国内问题的解决是其国际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大战略转向国内将是必然的，

^① 前美国驻上海总领馆总领事、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史伯明(Douglas Spelman)，2011年10月27日；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2011年11月2日；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② 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兰德尔·施韦勒，2011年10月28日。

^③ 兰德尔·施韦勒，2011年10月28日。

美国国际影响的减少也是必然的。^①当然,许多美国精英并不认为美国已经走上衰落之途,强调未来不会再出现新的全球国家,而美国将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国家,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战略调整。^②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伊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我们深信美国可以在新的世界中繁荣昌盛,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始于苏联解体的美国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进行战略调整乃势所必然。^③



在卡赞斯坦教授办公室(2011年10月31日摄于康奈尔大学)

美国的战略目标依旧是护持西方霸权、确保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重点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印度等崛起国家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确保领导地位并大幅度调整其国际战略,主要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从紧迫而恼人的中东挑战中脱身,转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确保全面参与决定未来的亚太事务。当前,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表现是,借助部分亚洲国家寻求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调整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介入力度,从而体现出制衡中国的态势,搅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国家

① 查尔斯·库普乾,2011年10月26日。

②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2011年10月31日。

③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Release 2.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的战略神经。

锁定的对手：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

美国时刻关注着大国兴衰，而中国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衰落的忧虑，美国各界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锁定的对手。当然，这里所谓的“对手”，其含义是最重视的竞争对象，而不是注定的敌手(adversary)。许多美国精英强调，中国不是崛起，而是正在走向复兴^①，其政治文化、经济实力、地区作为、外交政策值得密切关注。与对美国自身的判断不同，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影响力的转移^②，中国大战略有可能藉此调整，并对中国的走向忧喜交加。

在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的战略优势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乃至金融的全球影响力上，也体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稳步增强和地缘优势上。具体地说，美国许多精英认为，世界经济活力和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的经济崛起，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羡慕和钦服。^③ 这些精英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降低发展速度、实现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但相比而言中国已经渡过了危机，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并成为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领先者，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许多美国精英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表达了认可之意。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Stanley O. Roth)曾担任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亦曾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年，观察分析中国近30年之久，他指出：“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怀疑，但最愚蠢的就是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会激烈变革，实践表明中国总在变革，但不变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权。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④ 其他精英人士也对中国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接受变化与挑战并愿意采取经

① 傅立民，2011年10月4日；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2011年10月4日；尼娜·哈奇格恩，2011年10月14日。

② 纽约慈善总会副总裁伊阿宋·麦吉尔(Jason McGill)，2011年11月4日。

③ 戴杰，2011年9月30日。

④ 斯坦利·罗斯，2011年10月3日。